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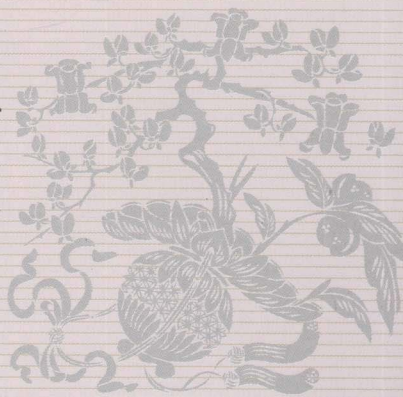
当代浙学文库
DANGDAI ZHEXUE WENKU

浙学

王姝 著

孙席珍评传

Sun Xizhen Ping Zhuan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浙江向有『半壁江山』之称。除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众所周知的大家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优秀作家对现代文坛做出了独特而卓绝的贡献。孙席珍的文学创作，不管是新诗、散文还是小说，都在汲取五四土壤营养的基础上开出了绚烂的花朵——被鲁迅誉为『诗孩』；《槐花》、《五妹》等散文体小说，将『自叙传』小说推上了情理交融的新的高峰，为其赢得『京华才子』美誉；『战争三部曲』在法国、丹麦、日本等国先后节译出版；『新乡土小说』代表作《阿娥》被斯诺选入《活的中国》，并称其为鲁迅之外最喜爱的小说。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任教于杭州大学，致力于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研究，以一人之力撰写的西欧、东欧、日本、印度、阿拉伯等国文学史，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013058029

K825.6
987



孙席珍评传

王
姝
著



北航

C1669403

K825.6
987

0130282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席珍评传 / 王姝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308-11660-2

I. ①孙… II. ①王… III. ①孙席珍(1906~1984)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8335 号

孙席珍评传

王 姝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18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660-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序

陈 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浙江向有“半壁江山”之称。浙江作家可谓群星璀璨:除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众所周知的大家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优秀作家对现代文坛做出了独特而卓绝的贡献。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浙籍现代作家进行了宏观而全面的研究,如“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浙江 20 世纪文学史”等。但具体作家的个案研究仍有值得开掘的地方。一是已有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多为以前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与方法都略显陈旧;二是由于受历史政治或社会原因的影响,或是难以纳入现有的学术框架中理解,一些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及文化史意义被逐渐遗忘,淡出人们的视野。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曾经目击过现代文学现场的作家后裔、亲友、学生,渐渐失去跟踪线索,他们鲜活的直接记忆、他们保存的一手资料更是亟待激活与抢救。因而,为丰富文学史的多元面貌、复活历史记忆,除了宏观理论的研究之外,对一些已被淡忘的重要作家的具体研究显得尤为迫切。现代文学绍兴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被鲁迅称誉为“诗孩”、后又担任北方左联书记的孙席珍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关注的对象。

孙席珍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已开始创作。他的“小诗”创作,出现在冰心、宗白华等人的“小诗体”渐渐消歇,新格律诗又尚未成熟的时期。他将“小诗”铺陈为抒情长制,兼具徐志摩的抒情与冰心的哲理之长,成为现代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过渡,鲁迅、刘半农等赞他为“诗孩”;他的《槐花》、《五妹》等散文体小说,是对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继承与创新,笔致清丽细腻,弥补了郁氏“自叙传”多狂呼而少情思的不足,更能在创造社的心灵自叙之外涂抹上文研会的社会写真背景,从而将“自叙传”小说推上了情理交融的新的巅峰,为其赢得“京华才子”美誉;亲历北伐战争的孙席珍奉献了“战争三部曲”,冯乃超、沈从文、冯雪峰等纷纷撰文评价,法国、丹麦、日本等国先后节译出版,孙席珍亦被称为“战



争文学家”；而在 30 年代的北平，孙席珍担任北方左联的领导人，他的“新乡土小说”代表作《阿娥》被斯诺选入《活的中国》，并称其为鲁迅之外最喜爱的小说。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文学创作实绩并未得到充分的肯定与评价。这可能与孙席珍的文学观有关。从文学走向革命的孙席珍向来认为文学应当是有所为的，但又不满于左翼文学粗疏空浅的标语口号式写作。这样一种文学态度自然有些两面不讨好的尴尬。于是在与现代评论派、革命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孙席珍往往陷入论争双方的中间立场。对于现代文坛的人事纠葛、思想斗争，孙席珍是身处其中，又作出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

孙席珍是创作与研究并重的文学教授。早在 30 年代，他的《近代文艺思潮》、《高尔基评传》、《辛克莱评传》、《英国文学研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等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或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以一人之力撰写的西欧、东欧、日本、印度、阿拉伯等国文学多为填补空白之作。受国家教育部委托，由先生主持翻译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至今仍是研究希腊文学的权威力作。

我在 50 年代曾亲受教于孙先生，他在课堂上幽默风趣，很能启发听者的学习热情。先生博闻强记，常常只用香烟盒纸一张，略作标记，便可对学生侃侃而谈，滔滔万言不能止。王姝是我的学生，她自 2006 年年末起，便来向我请教，开始研究孙席珍。几年来，她认真积累、检索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又多次采访孙席珍先生的亲友、学生，将口述所得与书本材料两相对照，钩沉爬梳，终于全面呈现了孙席珍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以及先生许多不为人所知的革命经历，并对之作出了不偏不倚的客观评价。其中，如对孙席珍与鲁迅、郭沫若、周扬等人的交往，大多同文学史上的重要史实有关，又同现代文坛的左右之争密不可分。类似这样的发现，大多从口述史实与原始资料中探寻而得，许多为第一次的解密，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王姝能沉潜为文，为孙先生勾勒了这样一幅生动完整的画像。这部著作不但丰富了浙江作家的个案研究，而且于私的角度来说，这恐怕也是师生间薪火相传的另一种形式吧，故我乐于为之向读者推荐，是为序。

2013 年春

目 录

第一章 跳着念书的贫家稚儿	(1)
第一节 没落的家庭	(1)
第二节 教会中学	(3)
第三节 初到北大	(6)
第二章 鲁迅交口称赞的“诗孩”	(13)
第一节 盛赞“诗孩”	(13)
第二节 师生情谊	(20)
第三节 京华才子	(28)
第三章 从“五卅”到“三一八”	(42)
第一节 学生领袖	(42)
第二节 《晨报》换帅	(52)
第三节 师生睽隔	(62)
第四章 与郭沫若在北伐途次	(70)
第一节 连升六级	(70)
第二节 南昌起义	(80)
第三节 战争小说家	(91)
第五章 北方左联与特别党员小组	(103)
第一节 北方左联	(103)
第二节 北平五讲	(112)



第三节 《文史》文“祸”	(115)
第四节 两个口号	(121)
第六章 “活的中国”与新写实小说	(128)
第一节 入选《活的中国》	(128)
第二节 新乡土小说	(134)
第三节 江西政治讲习院	(140)
第七章 立身讲坛的文学教授	(153)
第一节 甘守清贫	(153)
第二节 从反右到“文革”	(162)
第三节 现代文坛实录	(179)
孙席珍年谱	(195)
孙席珍著译要目	(211)

(1)	《文史》文“祸” 著一编
(2)	《文史》文“祸” 著二编
(3)	《文史》文“祸” 著三编
(4)	《文史》文“祸” 著四编
(5)	《文史》文“祸” 著五编
(6)	《文史》文“祸” 著六编
(7)	《文史》文“祸” 著七编
(8)	《文史》文“祸” 著八编
(9)	《文史》文“祸” 著九编
(10)	《文史》文“祸” 著十编
(11)	《文史》文“祸” 著十一编
(12)	《文史》文“祸” 著十二编
(13)	《文史》文“祸” 著十三编
(14)	《文史》文“祸” 著十四编
(15)	《文史》文“祸” 著十五编
(16)	《文史》文“祸” 著十六编
(17)	《文史》文“祸” 著十七编
(18)	《文史》文“祸” 著十八编
(19)	《文史》文“祸” 著十九编
(20)	《文史》文“祸” 著二十编
(21)	《文史》文“祸” 著二十一编
(22)	《文史》文“祸” 著二十二编
(23)	《文史》文“祸” 著二十三编
(24)	《文史》文“祸” 著二十四编
(25)	《文史》文“祸” 著二十五编
(26)	《文史》文“祸” 著二十六编
(27)	《文史》文“祸” 著二十七编
(28)	《文史》文“祸” 著二十八编
(29)	《文史》文“祸” 著二十九编
(30)	《文史》文“祸” 著三十编
(31)	《文史》文“祸” 著三十一编
(32)	《文史》文“祸” 著三十二编
(33)	《文史》文“祸” 著三十三编
(34)	《文史》文“祸” 著三十四编
(35)	《文史》文“祸” 著三十五编
(36)	《文史》文“祸” 著三十六编
(37)	《文史》文“祸” 著三十七编
(38)	《文史》文“祸” 著三十八编
(39)	《文史》文“祸” 著三十九编
(40)	《文史》文“祸” 著四十编
(41)	《文史》文“祸” 著四十一编
(42)	《文史》文“祸” 著四十二编
(43)	《文史》文“祸” 著四十三编
(44)	《文史》文“祸” 著四十四编
(45)	《文史》文“祸” 著四十五编
(46)	《文史》文“祸” 著四十六编
(47)	《文史》文“祸” 著四十七编
(48)	《文史》文“祸” 著四十八编
(49)	《文史》文“祸” 著四十九编
(50)	《文史》文“祸” 著五十编
(51)	《文史》文“祸” 著五十一编
(52)	《文史》文“祸” 著五十二编
(53)	《文史》文“祸” 著五十三编
(54)	《文史》文“祸” 著五十四编
(55)	《文史》文“祸” 著五十五编
(56)	《文史》文“祸” 著五十六编
(57)	《文史》文“祸” 著五十七编
(58)	《文史》文“祸” 著五十八编
(59)	《文史》文“祸” 著五十九编
(60)	《文史》文“祸” 著六十编
(61)	《文史》文“祸” 著六十一编
(62)	《文史》文“祸” 著六十二编
(63)	《文史》文“祸” 著六十三编
(64)	《文史》文“祸” 著六十四编
(65)	《文史》文“祸” 著六十五编
(66)	《文史》文“祸” 著六十六编
(67)	《文史》文“祸” 著六十七编
(68)	《文史》文“祸” 著六十八编
(69)	《文史》文“祸” 著六十九编
(70)	《文史》文“祸” 著七十编
(71)	《文史》文“祸” 著七十一编
(72)	《文史》文“祸” 著七十二编
(73)	《文史》文“祸” 著七十三编
(74)	《文史》文“祸” 著七十四编
(75)	《文史》文“祸” 著七十五编
(76)	《文史》文“祸” 著七十六编
(77)	《文史》文“祸” 著七十七编
(78)	《文史》文“祸” 著七十八编
(79)	《文史》文“祸” 著七十九编
(80)	《文史》文“祸” 著八十编
(81)	《文史》文“祸” 著八十一编
(82)	《文史》文“祸” 著八十二编
(83)	《文史》文“祸” 著八十三编
(84)	《文史》文“祸” 著八十四编
(85)	《文史》文“祸” 著八十五编
(86)	《文史》文“祸” 著八十六编
(87)	《文史》文“祸” 著八十七编
(88)	《文史》文“祸” 著八十八编
(89)	《文史》文“祸” 著八十九编
(90)	《文史》文“祸” 著九十编
(91)	《文史》文“祸” 著九十一编
(92)	《文史》文“祸” 著九十二编
(93)	《文史》文“祸” 著九十三编
(94)	《文史》文“祸” 著九十四编
(95)	《文史》文“祸” 著九十五编
(96)	《文史》文“祸” 著九十六编
(97)	《文史》文“祸” 著九十七编
(98)	《文史》文“祸” 著九十八编
(99)	《文史》文“祸” 著九十九编
(100)	《文史》文“祸” 著一百编

第一章 跳着念书的贫家稚儿

第一节 没落的家庭

1906年农历六月初一，浙江绍兴平水乡红墙下村，一户姓孙的小康之家，又诞生了一个男孩。这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了。在他上面，已有四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好在孙家此时尚算富裕，添丁也仍是件喜事。略通经史的父亲给小儿子起名叫做孙彭。做父亲的此时还不曾料到，这个后来改叫孙席珍（席珍为字，取《神童诗》“儒为席上珍”之义，后以字行）的家中幼子，注定会延续着东南文气，为绍兴平水又添新的骄傲。孙席珍，后来成为著名的“同康三孙”之一。“同康三孙”的另两位是叔侄俩：中国“能源之父”孙越崎、经济学家孙孚凌。而孙席珍的父亲与孙越崎的爷爷是亲兄弟。要是按辈分算，孙席珍还是“三孙”中最长的一位。一个家族里同时出现三位在不同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实属罕见。

绍兴平水，人杰地灵，有辛亥革命“浙东三烈士”之一的陈伯平；又有现代新诗最早的开拓者和倡导者刘大白。以大片大片竹林闻名的平水乡，一直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翠竹丛里，似乎让这些从翠竹丛中走出来的绍兴之子，也格外具备竹的清逸坦荡的精神气节。

1906年是近代史上一个寻常的年份，它虽不曾发生类似鸦片战争、百日维新、甲午战争这样的大事，却仍然在不可避免地向现代走去。无数普通人的



样一个无意于求取功名的旧式文人，他也不愿像家乡许多读书人那样入幕作师爷谋生，成为众多绍兴师爷中的一个。在新旧夹杂之间的孙父，尚不能探索到十分切实的新道路。他与三两相知，往各处旅行，曾经南涉港澳，北至塞外，长江上下，足迹殆遍。^①行万里路，本来是士人的游学传统，但近代士人的游学，显然已经打破传统的知识框架，别具睁眼看世界的味道。江南塞上，多事之秋，想来更可以从国事螭塘中看出传统庙堂价值的毁灭来。从这个意思上来讲，孙父的远游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新的游历的开端，他为孙席珍这代人的人生打开了新的局面。

孙父游历归来，便与人合伙做生意，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专门运销南亚和中东各国的茶叶庄。得益于远游所带来的开阔眼界，这家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孙氏茶庄经营得颇为不坏。不料孙席珍六岁时，绍兴老家遭了火灾，屋舍器具都被烧光。全家上下，除了已经出嫁的大姊二姊，都不得不起迁往上海居住。在狭小的上海弄堂公寓里，幼小的孙席珍初尝人生的艰辛。两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远洋航运受阻，对外贸易停滞，小茶庄经不起大风浪，就此倒闭。孙家的家境越发困难，在上海终于住不下去，只得又折返绍兴老家。这样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故事，我们在现代作家的身世遭际里似乎俯拾皆是。孙家家道中落的原因，第一次似乎是偶然因素，第二次则显现出历史的必然。天灾与人祸，往往接踵而来，就算是殷实之家，在国家安定与社会保障无从谈起的近代旧中国，也只是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其实一点点风浪都承受不起。也许昨天还富足怡然，今天便露宿街头。无数偶然的家道中落故事，恰见证出近代中国百姓的民生现实。

回到绍兴老家后，孙父先是在机关里觅得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因为不善逢迎，屡遭裁遣，最后终于失业。做生意时的一点积蓄用完之后，只能靠典当变卖度日。孙席珍的母亲粗识文字，能阅读绣像章回小说之类，又克勤克俭，在家境每况愈下的当口，还能把家里打点得井井有条。多亏了母亲的辛苦持家，孙席珍的童年才不致有失学之虞。孙席珍八岁时在上海汉文小学入学启蒙，一年半后回转家乡，转入绍兴第五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家贫儿早慧，孙席珍聪颖异常，读书又刻苦，结果边读边跳级，几乎是读一年跳一级，总共七年的小学，花了四

^① 关于孙席珍父亲的游历行踪，引自《悠悠往事·孙席珍自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年多的时间就顺利毕业。跳级读书,又让这个贫家稚儿省了一笔学费。这期间,从绍兴第五师范毕业的许钦文入五师附小担任一年级体育教员。这一师一生,尽管当时并未直接相识,却不曾料到,将来的人生彼此还有许多交集,并会在现代文坛上同样留下耀眼的光芒。孙席珍十三岁那年升入中学,勉强读了一年,家中经济实在难以支持。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让孙席珍跟随出嫁了的二姊转去外省继续读中学。

第二节 教会中学

1919年春天,十四岁的孙席珍跟随二姊转学到安徽芜湖萃文中学。这是一家教会中学。

安徽虽然算起来也还属于同一个大江南文化圈,但与浙东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更何况到了外省,寄食亲戚家也比不得在家中。人生的第一次远行,往往意义重大。它把人投入到一个全新的陌生氛围,逼迫自己从原先的小我中走出,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在不同观念的冲击下,开始痛苦而艰难的成长。对一个家境每况愈下的少年来讲,体味着人情冷暖,人世沧桑,在心智成熟的关键时期,这样一次远行,尽管时间不长(孙席珍在安徽芜湖只呆了两年),却接触到外省文化、异域文化(教会学校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窗口,孙席珍的外语基础最早也是在这里打下的)。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在这里,孙席珍间接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这为他进一步远行,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并进而成为一名新文学的诗人、作家和战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教会学校学费、食宿都便宜。孙席珍住校读书,每天的课程就是唱圣诗、念英语、背古文、做习题,有时也会到草地上打打网球。也许教会学校有意与时局保持距离,这些中学生的日子过得几乎与世隔绝。孙席珍是这个班上最年轻的学生,他平时总喜欢到阅览室翻翻报纸,因而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了解得最深: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协约国胜利,正在凡尔赛开和会;中国曾派十五万华工参战,也是战胜国之一。但操纵和会的列强,不但不同意放弃在华特权,拒绝中国收回在山东被日本人夺去的权利,反而还要强迫中国承认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而昏聩的北洋军阀政府正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纷纷表示反对。在安徽芜湖这个小城中,街头巷尾,倒也



平静,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孙席珍周末与同学走在街上走走时,不曾发现什么异常。但已然关注时事的孙席珍,却能在这平静下面看出异样,他隐隐感觉到一股不大安宁的气氛。

1919年5月4日是一个星期日。按教会学校的惯例,上午做完礼拜,下午休息,孙席珍便与同学们在操场上玩耍。将近傍晚,听到墙外远远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报童叫卖号外的声音格外卖力,嘶哑的声音里透着紧张,让人觉得终于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同学们立定了,竖起耳朵听,虽然没有七嘴八舌地讨论,却都感到异样,互相用目光交流。终于等到晚间,有同学拿了号外进来。晚自修教室里便不再秩序井然,大家团团围住,都挤在灯下看报纸,又不敢高声,有同学轻轻地讲:“呵!北京终于闹起来了!”

第二天上午,一切还如常。下午又看了报纸,空气就不大稳了。虽然还在照常上课,但个个都无心听讲。下课了,同学们都聚在教室里小声说话,不再像往常那样了无心地跑到操场上去玩。报纸上的消息飞速地在同学们口耳边相传:北京几千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中,高喊口号,游行示威。北洋军阀派了马队来冲,还抓去了好多学生。这消息让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十分气愤,他们态度鲜明地站在青年学生这边。一时间群情激愤,有的叫:“闹得好,就该这样闹!”有的骂:“卖国贼,只会压迫老百姓!”有的倡议说:“我们也应该有所表示。”吵嚷的声音越来越响。

这时,一位绅士气十足的洋教师出现在学生面前,他正是美以美会的洋教师汤普逊先生。他双手插在裤袋里,慢条斯理地开口了:“Boys, keep silence! 有话好好地讲,事情总弄得清楚的。慢慢来!你们的政府,会去交涉的。我们美国人,最讲道理,一定会支持你们,照公理去讲的。你们爱国,我们美国人也爱国,大家都爱国,这很好。现在,你们还是学生,应该努力读书,学科学。学科学是爱国,也就能救国,这才是好办法!”汤普逊先生平时教学很认真,对待学生和藹可亲,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当他这样说的时侯,没有人敢去顶撞他。但大家的心里,却暗自嘀咕:你究竟是站在一个外国人的立场啊,怎么能理解一个中国人,一颗弱国子民的心!

但从此以后,校园里不再像平时那样宁静了。五四运动的浪潮终于席卷了内陆小城。报纸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消息越来越多: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长沙……这里一个专电、那里一篇通讯,简直看都来不及。不久,有毕业的

同学从北京寄信回来,将当时的情景描写得十分详尽。一个人接到信,不一会儿工夫,就传遍整个学校。大家高兴得又跳又叫:真痛快啊!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还有同学传诵着五四运动中断指写血书的夏秀峰,冲进卖国贼曹汝霖家的急先锋胡霁霄、杨晦等人的英雄事迹,都又羡慕又钦佩。

火势燎原,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了。6月3日,北京、上海同时爆发了比“五四”那天更大规模的示威。当天北京一下子抓去三千名学生,警察局里都容不下,临时把北大第三院当作拘留所,教室里、操场里都关满了人。工厂纷纷罢工,商店纷纷罢市,各地云起响应。芜湖虽是小城,但沿江,有洋街,有码头,风气并不闭塞。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家都坐不住了。孙席珍与他的同学们上街买来许多红绿色的有光纸,刻钢板、印传单、写标语、糊旗子,标语上写的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还我山东”、“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等。一时间大家忙得不可开交。老师们也来参加了。有位语文老师引史书上的句子以示抗议:“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文绉绉的句子大家似懂非懂,就依样画葫芦跟着写。师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了。罢工罢市之后,街上静悄悄的,店铺十之八九都关着门。游行的队伍一路喊口号,一路散传单。也有同学在街角讲演,引来行人驻足而听。讲演的和听讲的都表情严肃,又热烈又冷静,像是积郁未爆发的地下岩浆在滚滚运行。孙席珍因为跳级读书,年龄小、个子小,却照样跟那些大一点的同学一起,严肃认真地做着每一件事,心里充满了爱国心与责任感。

那天,善良的汤普逊先生眼睁睁望着学生们走出校门,把右手放在胸前,嘴里念着“阿门”,也并不来劝阻。直到掌灯时分,大家回校,却发现汤普逊先生正似笑非笑地站在那里迎接,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也许汤普逊也已经越来越同情这些中国学生,但站在教师的角度,又无法全然赞同。这种矛盾与爱惜的心理,多少与北大蔡元培先生等人的心理略同吧。

这是五四运动的高潮。几天以后,在群众的威力之下,北洋军阀政府把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撤掉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运动取得了胜利。后来,北京中央公园的草地中央,竖了一块“公理战胜”的石牌坊,谁也不曾注意过它。两年以后,孙席珍已到北大读书,有次偶然经过那里,抬头向它一瞥,只觉得那是北洋军阀对自己的一种揶揄和嘲弄。

五四运动打开了少年孙席珍的眼界。从此以后,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



爱读书、学习好的乖学生，上课也不再唯教师的话是听。做礼拜唱诗的劲头也没有以前那么大，每次只像小沙弥念经一样随口哼几句就了事。一到周末假日，赶忙上街跑书店，节衣缩食，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回来；后来又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这些刊物。凡是买得到的，总是尽量买来。《湘江评论》因为是外地的，不大容易买到。李大钊、蔡和森、陈独秀、胡适……这些名字都成了少年孙席珍的崇拜对象。刊物上传播新思想的文章有的深入浅出，一看就懂；有的比较深奥，不大能够领会，孙席珍还是硬着头皮看下去。什么德谟克拉西呀，赛因斯

呀，布尔什维克呀，概念也不大分辨得清楚，但对孙席珍来说，都仿佛新鲜的养料。他贪婪地把这些新名词、新事物、新思想，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儿都往脑袋里装。这时候的他，越来越迫切地想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去把这些新鲜而复杂的名词彻底弄个清楚明白。

第三节 初到北大

两年后，十六岁的孙席珍中学毕业。在他眼前，摆着一条父亲为他安排好的安稳的人生道路。父亲已经为他四处托人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到银行当练习生的位置。但经过五四洗礼的孙席珍怎么可能满足于当一名银行练习生呢？那样一条在世人看来十分稳妥的道路，不啻是一种精神的活葬。

他几乎没有犹豫一下就拒绝了父亲的好意。一到秋天，他就直奔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思想的中心——北京。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是从亲友处筹措而来。初到北京，孙席珍拖着两件破旧的行李，步出车站，四顾茫茫，不辨方向，于是他



图1 《悠悠往事》书影

雇了辆街车，路上经过天安门，向巍巍的华表望了两眼，他心潮起伏，不能自己，心中默念：北京，我来了！车到沙滩的红楼，这里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孙席珍抬头向上望，低头向下看，想到这几年将在这里学会赛因斯，学懂德漠克拉西的道理，一颗激动不安的心终于沉静下来。

孙席珍成绩优异，不经预科，直接考取了北大哲学系。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何况他还只有十六岁。到北大后，孙席珍办好各种入学手续，搬进银闸一间小公寓，安顿好了行李。第二天早上无事，他独自跑出德胜门，第一次遇见了一串串驼铃。那时的德胜门，还没有成为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中心，北京城的旧貌尚在四合院沉稳的气息中凝固。一出城墙，风景殊异，德胜门外的景象已经与塞外略同。见惯南方阴雨连绵天气的孙席珍只觉得北方的天特别高特别清澈，北方九月的风吹来颇有些寒意了。而那负着重负的骆驼，却像满不在乎似的，排成行列，只顾昂着头，一直朝着苍茫无际的前方走去。孙席珍一时不免有点黯然，但随即想到，它们将踩着坚实的脚步，横穿过荒凉的大沙漠，最后终将觅到绿洲，他的心似乎又很踏实了。“骆驼呀，骆驼呀，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我愿跟着你们一步一步向前走。”北方文化一下子把辽阔坚实的境界展现在孙席珍的面前，开始磨砺这个南方少年的心。

孙席珍在北大读书，经济十分紧张。他家境本来就困难，何况求学还违拗了父亲的意愿。孙席珍几乎每月的伙食费都不大挤得出。再加上他急于求知，见到新书报，总想买来看，这样就更加捉襟见肘了。幸好经绍兴同乡兼师长孙伏园先生介绍，他到《晨报副刊》担任校对，每月有十五元的收入，半工半读才勉强维持了下来。《晨报副刊》报馆在宣武门外丞相胡同，距离沙滩有十多华里，每天下午三四点下课以后，孙席珍就得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北池子出前门，穿过杨梅竹斜街，跑到报馆工作。晚上十点多，才能赶回寓所。常常赶不上晚饭，他就路上吃两个饼、一包花生米充饥，边走边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论风霜雨雪，没有假期，没有休息，孙席珍已经习以为常，也从不觉得苦和累。

孙席珍一开始就选择了哲学系。在他心目中，哲学是以万有全体为对象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它是一切知识的总和，是以探索各种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为目的的学问，学了它，可以一通百通。进一步来说，哲学不仅仅属于知识体系，以满足理性要求为旨归，而且对于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同时，哲学重在修养与实践，最终目的在于解决各种人生问题，所以古希腊



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才以“知德一致”教人。求知心切的孙席珍饥不择食般地到处听课：陈大齐的哲学概论、徐炳昶的西洋哲学等。但不久，他就发现哲学史上流派各异，众说纷纭，反而弄得莫知所从；后来又听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和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更加觉得虚虚实实，幽深难解。在纯理论的哲学探索中，少年孙席珍越来越困惑，他一面怨自己的水平太低，接受不了，一面却更加渴求真理。他想：原是为了要想通达事理才来学哲学的，结果却越学越糊涂。也许这种脱离实际的纯理论探求，意义不大，渐渐地他就没有开始那么大的劲头了。

但孙席珍并没有就此放弃学习哲学的念头。他从纯理论的本本主义，转向了广阔的社会天地。他主动扩大学习的领域，选读了李大钊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应地还去听马寅初先生的正统经济学。历史、社会、现实，把虚空的哲学问题落到了踏实的大地上。在对社会真理的探求中，孙席珍渐渐觉得自己的脑筋似乎开了窍，进而就想较全面地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所理解。于是课外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著作找来读了又读，又设法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欧文的著作，甚至连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也一一加以浏览。孙席珍这种近乎贪婪的大量阅读，其中读不懂的地方简直不可胜计，没处请教，也没人指导，只得硬啃。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引证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与社会历史知识，几乎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全部历程。少年孙席珍被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精辟见解和对人类社会的理想性追求深深吸引。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他又自行补课，读了好几部世界史，特别是近代史，连带还看了些地理方面的书，兼及国际政治。尽管当时的孙席珍在《晨报副刊》半工半读，勉强糊口尚可，但要满足求知的需要，以他当时的经济能力，这样多的书，怎么买得起？他只能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淘，有时花几大枚才能买到“第二手”的小册子，其余大部分的书，就非到图书馆不可。从此孙席珍下午就不大上课，经常跑西城京师图书馆，往往整个下午呆在那里，边看边做摘记，冬天还可借以取暖。孙席珍总要到闭馆时才出门，然后彳亍着步出宣武门，到报馆里去混一顿晚饭吃。去的次数多了，图书馆里照管阅览室的执事见到孙席珍总是笑嘻嘻地同他点头。一位年纪较大的管理员还常常同他攀谈几句，称许孙席珍为“勤学苦读的好小子”呢。

因为学习西方文化的需要，孙席珍迫切地感觉到外语的重要性。当时许多

想要阅读的名著，国内还没有译本，只能靠自己硬啃。好在孙席珍上的是教会中学，英文的底子并不差。他又从头开始学第二外语法语，从字母开始学起，很费力。但一经掌握规律，进度倒也不慢。孙席珍学外语，主要是为了阅读。他常常字典不离手，靠着刚掌握的一些语法规律，就开始啃大部头；虽是烦难，却并不灰心，仍然孜孜兀兀。凡是外语课，每堂必到，每天起早落夜，总要花几个小时在外语学习上，竟渐渐有所成了。

北大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五四新思潮从这里发源，西方文化也借着这个重要的交流窗口引介。学校常请一些洋教授如杜威、罗素、杜里舒等来讲学。虽然因为语言的关系，孙席珍不大听得懂，但每次也总会去凑热闹。印度诗圣泰戈尔来了，是个大热天，孙席珍帽子也来不及戴，赶到先农坛，听他用流利的英语讲《吉檀迦利》；盲诗人爱罗先珂来了，孙席珍连忙挤进教室角落里去，听他用弹奏曼陀林一样的声音，朗诵他的《桃色的云》。这些鲜明而有趣的人物，给孙席珍带来了新的视野。他只觉得自己什么都想学，什么都去听，却什么也没有学好。仿佛慌慌张张地，到处看看学学，眉毛胡子一把抓，乌七八糟一大堆，只是囫圇吞枣地一股脑地往肚子里塞。

少年孙席珍妄想成为一个“通家”。他什么都抓，什么都想学，意图获得更为广泛的知识。唯独对于文学，孙席珍却抱有一些偏见，不大重视。这倒并不是受了柏拉图认为文学是“摹仿的摹仿”的影响，而是从庸俗的功利观出发的，认为它大之不能够经世济时，小之不足以安身立命，因而对它比较冷淡。话虽如此，孙席珍也并没有完全加以排斥。常常，看理论书籍看累了，他也会找些文学作品来阅读，作为调剂。因为文学作品里有故事情节，看看也富于意趣；有喜怒哀乐，读了也颇为感人；也常描述一些世态风物，传达一点科学知识，不但能怡情悦性，增长见闻，还包含许多人生哲理、宇宙真谛。每部作品、每位作家在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里，都在传达他独特的人生观、世界观。文学世界见仁见智，各各不同，却一样发人深省，引人遐思。就这样，从休闲出发的文学阅读，同样深深地吸引了孙席珍。文学作品也渐渐成为他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了。

这期间，孙席珍读了许多中国前辈作家的作品和若干外国文学名著。孙席珍最崇敬的现代作家是鲁迅和郭沫若。他从他们的作品中受了很多教育，得到不少鼓舞。后来为了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文学，孙席珍就到中文系去听黄晦闻讲诗、刘毓盘讲词、吴瞿安讲曲、鲁迅讲中国小说史、周作人讲欧洲文学史、张



凤举讲文学概论，还到英文系听了一点英诗和英、美小说的讲述。不过这些课程，都是时断时续地去听的。从头到底听完了的，只有周氏兄弟的中国小说史和欧洲文学史两门。孙席珍在暮年写回忆录时，曾经充满崇敬与怀念地写道：

周作人学识相当渊博，我的一些外国文学基本知识，开始可说是得之于他的传授；听鲁迅先生的课，则不仅获得这门课的专业知识，还教导我们怎样学习，怎样写作，怎样认识历史和社会现实，怎样辨别是非、真伪、美丑、善恶以及怎样做人的道理，觉得受益特别大。^①

孙席珍与文学的情缘之路，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他们大多并不像曹丕那样志得意满：“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们往往从为人生的切实需求中，从腹饥身冷的贫困中，点燃这精神追求的火花，又试图借助文学的精神拯救力量，重返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这样一条社会——文学——社会的道路，正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那种挥之不去的社会责任感。周氏兄弟不同的文学观念，也对孙席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时，尽管周氏兄弟二人尚同在新文学阵营中，但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一系列重要论文的发表，已经与鲁迅毫不妥协的凌厉之气拉开了差距。孙席珍从一开始就站在两条文学道路的中间。孙席珍的第一首诗歌，就是由周作人亲自修改并亲自推荐到报纸上发表的。而孙席珍的“诗孩”之美称，又是由鲁迅先生亲自点头称许，并且书面成文的。这大概也预示了孙席珍的文学创作之路，会在激进与保守、严苛与从容、革命与闲适、“为人生”与“为艺术”等双重话语之间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褶皱与层次来。

就这样，学了好些门类的课程，读了许多不同流派的著述，也写了不少的新文学诗篇，开始时眼花缭乱，是非莫辨，总想什么都抓住，什么都经历一番，但渐渐地，孙席珍开始寻找找到自己的道路。是与非，真与伪，进步与保守，正确与错误，终须一一鉴别，因为真理只有一个，道路只能选择一条。于是，孙席珍暂时放弃了已经小有成绩的文学创作，摒绝了那些五花八门的书刊，一概不予理睬。他一赌气之下，把几年来从四面八方搜罗来的各色各样的书刊，拿根草绳一捆，统统卖给了打小鼓的。此后，孙席珍只注意阅读《新青年》，特别是《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专心一意地在这上面找寻真理，终于明确了马列主义信仰，认

^① 孙席珍：《孙席珍自传》，《悠悠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页。